



《實踐符號學》專書寫作的背景與前景

張漢良*

前言

筆者收到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編輯同仁來函，略謂前此執行的《實踐符號學》專書寫作計畫「業已結案」，要求本人「分享專書寫作經驗，擴大交流」云云。筆者旋即函覆，謂書稿接近完成，但尚未交稿給國科會審查，距出版還遠等等。編者回覆說人文處已同意推薦我撰文，故暫時在法理與邏輯條件不十分滿足的情況下，撰寫這篇短文，作為未來出版的預告。

一、寫作計畫緣起與題材選定經過

筆者從民國 80 年起長期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81 年曾主持大型整合型計畫，主題為「文學理論」。參與該整合計畫的學者包括李有成、單德興、廖朝陽、朱崇儀和齊隆壬等學者。整合計劃通過後，參與者分別向國科會提出子計畫。本人提出的子計畫是「都市與文學正文研究」。該項子計畫為三年計畫，於 84 年完成。85 年到 88 年執行第二項多年期研究計畫，主題環繞著符號學在古典末期和中世紀初期的萌芽現象。從 89 年到 96 年，本人承蒙國科會支持及補助，繼續執行多項研究計畫，包括「哲學對話文類初探」(89-92)，「跨媒體符號學芻議」(90-91)，「符號學的生命基礎—以塔爾吐學派為例」(91-94)，以及「自然歷史與自然系統的文本初探：林奈、達爾文、李時珍」(94-97)。上述計畫的研究成果，已經向國科會陳報結案，附帶生產的論文也多數經國際學術會議發表，或期刊披露，或收入專書。這些論文雖然都由不同的角度出發，為符號學探原，並皆以實例為演練的場所，然而整體說來，尚未能構成嚴密的系統，初與符號學的系統立論有所出入。因此筆者面臨退休之際，向國科會提出為期兩年的專書寫作計畫，名為《實踐符號

*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名譽教授

學》，一方面有別於系統性建構，另一方面點出符號學實踐之意。以下略為說明學術背景。

二、寫作計畫學術背景

就過去近二十年筆者所執行的國科會計畫看來，個人的研究都和符號學的早期發展歷史有關。涵蓋的範圍廣泛，包括西方古希臘哲學、拉丁文學和中世紀教育制度，以及現代符號學發煌時期的生物學背景。顯示筆者企圖走出以 20 世紀初期美國哲學家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為起點的歷史框架，往前追溯符號學的「史前史」。就這層意義上，筆者無疑在回應符號學家艾科（Umberto Eco）於 1983 年撰文所呼籲的朝向世界符號學通史建構的芻議。艾科指出這部臆測中的、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世界史》有三個方向：嚴格定義之下的、寬廣定義之下的，以及「百科全書式的」，亦即「實踐性的」符號學。此正說明本書之源起。就實踐層次而言，筆者的著力點之一，是根據現代符號學觀點重讀中國上古的哲學典籍，具體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針對先秦諸子對語言的考察與論辯，如墨家、莊子、荀子、公孫龍、與孟子，以及這些典籍所蘊含的生態符號系統概念。

國內的符號學論述相對地比較少。1980 年代先後有古添洪的《記號詩學》（東大 1984）和高辛勇的《形名學與敘事理論》（聯經 1987）等專論，然而針對符號學淵源的探索，以及非文學文化文本，如哲學文本的考察和分析，迄今尚未有系統的著作出現。中國大陸的這方面研究，尤為薄弱。1998 年筆者曾為英文期刊 *Tamkang Review*《淡江評論》28 卷 2 期籌劃編輯《中國符號學》專號，專探上古符號思想，發表之論文獲得國科會傑出獎；2005 年 12 月曾為國內《中外文學》月刊主編《生物符號學》專號，首度引介這門日漸盛行的新興學科。此外，由於本人近年來與國際研究群合作，經常參與會議，發表研究成果，復因應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美國符號學季刊》、*Journal of Biosemiotics*、*Sign Systems Studies* 等刊物之邀約，撰寫相關學術論文，已經累積了相當的寫作能量。以上所舉刊物中，《美國符號學季刊》已於 2008 年刊出兩篇申請人的古典符號研究論文。本專書和坊間的同質性著作，如 Giovanni Manetti 的 *Theories of the Sign in Classical Antiquity*（英譯 1993），最大的出入在於本書選擇若干重要文本，從事精讀和深入的分析，順便探索



符號學淵源。本專書的出版，當可彌補國內文獻不足的缺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人前後多次在台大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和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開授古代符號學課程，並指導宋維科、蔡仁傑、林熙強三位博士生，以古代符號思想研究完成博士論文。追隨本人研習生物符號學的簡瑞碧博士和葉玉慧博士，除了在大學任教外，已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台師大翻譯研究所的博士生吳碩禹隨筆者建構生物符號學翻譯理論，專著已在 SCI 刊物 *Biosemiotics* 發表。就以上成果看來，本書寫作的基本材料已大體完備。

三、《實踐符號學》專書大綱

本書分為四篇二十章，都四十萬言，大綱如下：

第一篇 上古符號考察之一

- (一) 邏輯辯證與修辭的傾軋：論柏拉圖的早期對話
- (二) 斯多噶學派和伊比鳩魯派的符號思想：重讀斐羅梅勒《符號論》
- (三) 三門四科的史前史與後期演進：重讀拉丁文學《神凡配》
- (四) 聖奧古斯丁的三本符號論著：一個索緒爾和維根斯坦的解讀
- (五) 柏拉圖和普爾斯的肖像符號論：歷史斷層或連續？

第二篇 上古符號考察之二

- (六) 符號系統的演化：從《周易》到《文心雕龍》
- (七) 先秦的名實論爭的符號學涵義
- (八) 墨辯、公孫龍和現代符號學
- (九) 莊子和孟子文本中的生態符號系統
- (十) 司空圖的《詩品》如何揭示「文本間性」？

第三篇 書寫符號學

- (十一) 漢字的遐思之一：從萊布尼茲的「普世書寫」到德希達的《書符學》
- (十二) 漢字的遐思之二：艾森斯坦的漢字與影像符號
- (十三) 書寫與語言：重估布拉格語言學派的書寫符號論
- (十四) 漢字的符號系統：一個普爾斯的考察

第四篇 生物符號學

- (十五) 林奈的生物分類與自然書寫的現代符號意義

- (十六) 林奈和達爾文如何為自然建碼？
- (十七) 生物符號學之父烏也斯庫爾是符號學家嗎？
- (十八) 論生物學和文學中的寄生現象
- (十九) 論自然災難和符號學

第五篇 結論 符號與漫遊者

- (二十) 主體性、我和妳：莊子、卡希勒、本維尼斯特、普爾斯

四、《實踐符號學》內容摘錄

摘要一（摘自第八章）

《堅白論》的問難顯示客人提出一個吊詭，因為石是個體 (token)，也是類型 (type)，其為石的特性是自主的，但是石的特性基於兩個以上的內涵特質「堅」與「白」，用皮爾斯的術語來說，問 1 顯示出雙重混淆：一、實物符與法則符的混淆；二、實物符與質符的混淆。此地的語意問題和《梅諾篇》中 *arête* 所引發的語意問題相似，這個問題在《詭辯家》中有更詳盡的發揮。顯然客人的假設是謬誤的，因為內涵意與外延意或者法則符與質符的分佈不在同一個語意層次上，但是主人並沒有對這點產生困惑，因此他不急著區分這兩種符號。真正讓他困惑的是兩種感官符號，或者普爾斯所謂的指示符號，一個是視覺的，一個是觸覺的，竟然會被混淆，難道因為它們皆構成石的特性嗎？換句話說，這兩個內涵特質或者質符應該首先被厘清，這使得主人必須從客人的 P 命題移轉到他自己的 Q 命題，我對問 1 的解讀多少已澄清了原文中石與石性的不可區分的吊詭。主人在答 3 的回答澄清了內涵意與外延意，但是他未能說服客人，因為客人的假設是白與堅的先驗性。主人提出答 4 句使得對話朝向另一個層次發展，是客人所始料未及的。也就是說，他把石的內涵意訴諸經驗論，白或堅必然存在於人的經驗中，人的經驗可以區分這兩種特質。我們請繼續看問 7 到答 9。

客人的問 7 以幾何學的類比提出反駁，蘇格拉底在《梅諾篇》中正是以幾何學例證來推論形相、成分的不可區分性。主人的答 7 似乎沒有答覆這個幾何類比，但他指出質符的不確定性，也等於間接駁斥了這個問題。有趣的是，客人提出的幾何類比指出幾何形相包含了物質，這是通篇對話中兩個僅有的例子之一，可以被人從事政治互文性的解讀。另外一個相似的例子就是主人的結論答 9。這種政治詮釋和本文的討論無關，但是如果想要瞭解公孫龍



隱藏的分離主義意識型態，這點卻是很重要的。

和《梅諾篇》與《師說》一樣的，《堅白論》最後的一個說話者是贏得辯論的人，最後給了一個比較長的獨白作結論。本篇的勝利者顯然是主人，雖然他不到一百字的獨白與蘇格拉底和奧古斯丁獨白結論的滔滔不絕難以相提並論，我們還是可以問同樣的問題：主人真的勝利了嗎？客人被說服了嗎？除了最後主人的獨白結論外，沒有文本證據可以顯示兩個對話者獲得妥協。如問 1 到答 2 顯示客人的 P 命題受到主人的 Q 命題的答覆，奇怪的是，P 命題好像是基於贊成「離」的立場，而主人的答 3 似乎在暗示「合」的可能，也就是說「石加白加石之性加堅」。由於主人奇怪的論辯轉向，看來似乎自相矛盾抵觸，於是客人提出問 5，好像在反對他自己原來的「離」的立場，換言之，客人的論辯是 R 的命題，不再是 P 命題了。因此在問 2 到答 2 中，主人策略性的讓步中間包含了一個隱藏的埃倫科，目的是要誘導客人從「離」走向「合」，當後者也就是客人在問 7 中提出一個錯誤的幾何類比時，他只有面臨失敗一途。因為在一個平面空間中，即使界線分明的矩形（也就是原文的「廣修」），廣與修和堅、白不同，不能算是內涵特質（？），我這裏的討論會引發非常複雜的空間語意學（the semantics of space）和幾何圖形作為空間模式的語意學（the semantics of diagram as model of space）的複雜討論。

《堅白論》的對話結構和前面兩篇表面看來風馬不相及的西方對話作品，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在中文原文中，戲劇性（所謂的戲劇性就是使用對話這種技巧，英文我們叫它 dramatization）幾乎完全不存在，也可能由於這點使人忽視了公孫龍作品的文本性。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哲學家關注的是思想內涵，很少考慮載道的文本；至於文學家呢，則根本就不會對這種缺乏戲劇性的文本感興趣！對話開始的句子是：「堅白石三，可乎？」這裏面包含了一個雙重的對話結構。問 1 並不是在問堅、白、石是不是三件事物，而是在問：「我們可不可以問『堅白石三，可乎？』？」請問這兩種讀法有什麼差別嗎？我認為差別大的不得了！因為第二種讀法包含了人們對於使用語言來規模世界的後設語言思考，我在別の場合曾指出這種後設思考便是語言學的基礎。正是由於這種對話性建構了有關知識論與本體論的抽象討論的文本，這種文本使得一個研究文學的人，也就是我自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這一層意義上來說，公孫龍子參加了柏拉圖和奧古斯丁，共同建構了艾科在 1983 年所提出的世界符號學史工程。

摘要二（摘自第十九章）

生物學與文學研究長久以來便有密切的關係，學術界流行的許多文化理論泰半具有生物學基礎，卻很少被人提到。舉例來說，透過正文化作用，物群生物學發展出殖民論述，而環境生物學則發展出生態詩學。人跟環境的互動，就像文學與環境的互動。我們可以從社會生物學的觀點出發，來探討這些問題。

我曾經把文學研究的生物論述分成兩類，第一類屬於生態政治學的文學研究，它和大多數以意識形態與身份政治學為基礎的文學批評近似，發展出教條和閱讀策略，以政治姿態和倫理介入的方式，探討文學或文化文本——無論是當代的或古代的。第二類屬於生態科學的文學研究，以生態系統為基礎，具有相對的科學實證性和系統性。甚麼是「生態系統」(ecosystem)？《牛津大辭典》提供的第一個例句是：「生物與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的互動所建構的關係系統」(1935年)。1963年的一個例句表達得更為清楚：「生態系統是生態學的基本單元，由動、植物和它們所影響的環境構成」。這些說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我手邊使用的生物學課本中有一句話：「海洋是地球上最大，最少被探索的生態系統」。這本流行的教科書給生態系統所下的兩個定義和《牛津大辭典》大體相同：(1)「某地區所有的生物總體和非生物的互動」；(2)「某生物社群及其物理環境」。這些例子無非都在說明一個事實：我們必須以「系統互動」的概念來思考生態現象。舉例來說，自然災難研究屬於環境生物學或生態科學很重要的課題，其中與人互動的是非生物的自然因素，由此出發，推廣到其他層次。

近年來我做了三個個案研究，它們處理生態系統，而不是皮相的生態批評。第一個個案是生物學和文學中的寄生現象；第二個是自然災難；第三個探討先秦諸子文獻中的生物符號學概念，都已經為國際核心刊物驗收。¹ 本文

¹ 張漢良，〈寄生符號學芻議〉，《符號系統研究》，31卷2期，2003年，頁421-439 (Han-liang Chang, "Notes towards a Semiotics of Parasitism", *Sign Systems Studies* 31. 2 [2003]: 421-439)；張漢良，〈災難符號學——另類全球(化)符號學？〉，《符號系統研究》，34卷1期，2006年，頁215-223 (Han-liang Chang, "Disaster Semiotics: An Alternative 'Global Semiotics'?" *Sign Systems Studies* 34.1 [2006]: 215-223)；張漢良，〈自然與文化之間：西元前四世紀中國哲學的生物符號世界〉，《美國符號學期刊》，24卷1-3期，2008年，頁159-170 (Han-liang Chang,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A Glimpse of the Biosemiotic World in Fourth Century BCE Chinese Philosoph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Special Issue on Biosemiotics] 24.1-3 [2008]: 159-170)。



是根據第二項個案研究發展出來的。在進入正題之前，讓我從今天在內地走紅的英國學者蘇珊·巴斯奈特開始談。巴斯奈特於 2006 年發表了一篇文章，〈二十一世紀比較文學反思〉，被翻譯為中文後，也陸續引起許多討論。文中舉了一個新的比較文學實例。2005 年 11 月學者聚集在里斯本，討論 1755 年萬聖節的里斯本大地震這個自然災難對歐洲思想和文化的影響。她認為這一類研究是當前比較文學家可以關注的課題。說來也是巧合，2004 年 12 月 26 日東南亞和南亞遭逢到前所未有的，由蘇門答臘地震引起的海嘯襲擊，死亡人數達到 25 萬人。2005 年 6 月，也就是里斯本會議之前，我在芬蘭的符號學夏令營發表了一篇文章：〈災難符號學——另類「全球符號學」？〉，文中也談到里斯本地震的文化含義。這篇文章的命題是：從地球科學和社會科學出發的災難研究已經成為顯學，然而符號學尚未就此著力。我根據符號學的開山祖美國哲學家普爾斯（1839-1914）和 18 世紀蘇格蘭經驗哲學家湯瑪斯·瑞德（1710-1796）的符號理論，並參考目前從事災難研究的社會學家的論點，演繹出一套人以及其他生物和自然災難互動的模式。這個實例研究和巴斯奈特所舉的里斯本地震論述，以及後來的「〔四〕川震論述」，同樣見證到一項事實：全球性的災難現象對於文學家和比較文學研究者可能有的啟發；以及比較文學家如何因應外在世界的變動，而調整研究方向。這種生態科學的文學研究誠然是全球化的產物，也反映出人類地球性的關懷。

五、給未來想申請「專書寫作」的學者一些建議

撰寫專書需要靠長期累積的成果，不是一、兩年擬訂計畫，每天寫幾百字就可以如期完工的。筆者研究符號學近四十年，才敢冒大不韙提交專書寫作計畫，仍苦於時間不夠。要寫書必須完全退休，或至少休假一整年，始得為功。此為肺腑之言，望讀者勿以兒戲視之。